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为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汉籍中，关于泰国有多种称谓，如林阳国、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真里富国、暹国、登（丹）流眉国等，从明代始，称其为暹罗。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暹罗才改称泰国（英文译名由Siam改为Thailand）。按照泰国历史书写惯例，13世纪由泰人正式建立的素可泰王朝为其正史之开端，之前的相关古国多为古代扶南、真腊之属国。因此，古代历史上的中泰友好交往，上溯至林阳国、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等孟人建立的古国时期，则有上千年之交往，若以素可泰王朝为开端，亦有六百多年之友谊。

中国与泰国的友好交往，始于孟人建立的古国时期。唐贞观年间，堕罗钵底国曾两度（638年、649年）派使节到长安献象牙、火珠等物，唐朝则回馈骏马等物。两宋时期，古代中国与罗斛国、真里富国和登（丹）流眉国等古国之间关系密切，往来不断。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廷派使节出访罗斛国，罗斛国亦回访，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罗斛国贡驯象。据《宋会要》记载，南宋与真里富国之间的交往，始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该国国王遣使贡瑞象两头以及象牙二十株、犀角五十株、土布四十条等，南宋回赠红绯罗绢一千匹、绯缣绢二百匹等。其所献两头驯象，于嘉泰元年（1201年）送达南宋都城。此后，在嘉泰二年（1202年）、开禧元年（1205年），真里富国皆献瑞象等物，南宋均按照“约计所进物价，申尚书省以凭支降回赐”。元朝与罗斛国的关



□ 方天建

古代历史上的中泰友好交往

系也非常友好。据《元史》记载，罗斛国先后5次遣使出访元朝。在孟人所建立的古国中，堕罗钵底国的犀牛角和罗斛国的香料驰名中国，是古代中泰间开展友好往来的重要载体。

13世纪泰人建立素可泰王朝之后，古代中泰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暹国或速古台，即泰国正史所载之素可泰王朝。《新元史》记载，“暹国，北与云南徼外八百媳妇接壤，东界安南，西北距缅甸”。《元史》记载，元朝与暹国之间遣使互相往来10余次，其中元朝遣使出访暹国3次，暹国遣使出访元朝8次。尤具代表性的交往是大德三年（1299年），元廷赐暹国世子虎符，赐金缕衣。元人王尚志在其《暹国回使歌》中提到，元顺帝继

位，暹国“继进金字表章，九尾龟一，象、孔雀、鹦鹉各二”，与之对应的是“朝廷以马十四赐其国王”。

中国古籍对泰国古称为“暹罗”，源于1349年暹国与罗斛国合并后的称谓。因此，在《明太祖实录》中，自洪武四年（1371年）该国国王参烈昭毗牙遣使出访明朝开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大多称该国为“暹罗斛”，显示出鲜明的两国合并称谓特征。《明太祖实录》显示，“暹罗斛”与明廷之间交往频繁。在20多年的时间里，该国使者出访明廷达20余次，年均一次，彰显出密切的朝贡贸易特征。洪武十年（1377年），暹罗斛国王遣其子昭禄群膺奉金叶表、贡象、象牙、胡椒、苏木等物，明太祖命礼部

员外郎王恒携将士311人出访暹罗斛，为洪武朝出访暹罗斛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活动，表明明廷对两国关系之重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罗斛国遣使奉表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171880斤，明廷则赐使者丝绸、衣服以及钞票等物。

“暹罗斛”的称谓，在《明太祖实录》中，亦偶称“暹罗”，至明永乐年间，“暹罗”成为固定称谓。从永乐年间至崇祯年间，据《明史》统计，暹罗出访明朝共50余次，其中永乐年间14次，宣德年间3次，正统年间5次，景泰年间2次，天顺年间2次，成化年间6次，弘治年间4次，嘉靖年间5次，万历年间6次，天启年间2次，崇祯年间4次，可见双方交往之频繁。

值得关注的是，受郑和下西洋之影响，明永乐年间是暹罗遣使出访明廷的高峰期。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出使西洋诸国，同年暹罗亦来访。永乐六年（1408年），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暹罗来访。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从西洋回归，暹罗来访。永乐十年（1412年），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暹罗来访等。此外，明朝洪武年间所设国子监中，亦有暹罗官生入监读书。为了适应双方互访乃至贸易之需，万历年间，明廷还专门增设暹罗馆，用以通译暹罗语言文字，增进彼此交流。就暹罗的贸易物品而言，主要有象牙、香料、名贵中草药和各种类型的布匹等60余个品种。

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专门

就南海诸国如暹罗、安南等在明代即已形成的友好交往事实，加以认可，“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为清前期与暹罗形成友好的朝贡贸易交往，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正式接受暹罗遣使贸易之举。《清史稿》记载，康熙年间，双方有6次友好交往，其中暹罗出访和贸易4次，清廷出访1次，清廷主动要求暹罗来免税进入中国赈灾1次。雍正年间，双方朝贡贸易交往两次。乾隆年间，双方友好交往10余次，清廷还主动调解暹罗与缅甸之间的冲突，强调两国应该“睦邻修好”。

总体来看，古代历史上中国与泰国诸多政治和经济交往，以及以明代暹罗官生到国子监读书为代表的文化交往，呈现出和平友好的特点，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友好交往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由于暹罗属于元明清朝贡贸易圈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友好交往关系，也受到了当时中国学人的关注，留下了大量有关暹罗记载的文献。正如元人王尚志《暹国回使歌》所写，“江东先生远叩门，口诵暹罗回使歌”，充分体现了中泰之间千余年友好交往历史的源远流长。



（上接1版）
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从中央政治局抓起。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行动作号令、以身教作榜样，为全党作出表率、立起标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带头改进作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切实抓好分管领域、部门和所在地方的贯彻落实。自上而下、以上率下，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成为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经验。

认认真真、锲而不舍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抓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讲认真。”制定中央八项规定时，一开始就不加“试行”两字，就是为了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在执纪审查中，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明确没有“丹书铁券”、没有“铁帽子王”。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召开中央全会、中央纪委会等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都对作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都要听取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作风问题的反复性和顽固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从2013年3月中央纪委首次向全国公开通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以来，通报曝光制度不断健全。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中，过去“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迎刃而解。

健全制度体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只有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扎紧制度的“篱笆”，以刚性规定让党员干部明白什么样的作风应该发扬、什么样的作风必须反对，确保作风建设有所依归、有所遵循，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出台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廉洁自律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等一批党内法规，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纳入其中，为作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中央八项规定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结合实际制定了贯彻落实的实施办法、细则及配套制度。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构建建起系统、立体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持续巩固了作风

建设成果。

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保持了先进性纯洁性，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净化，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巩固，执政能力持续提升，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一张“金色名片”。习近平总书记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时指出：“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经过10余年坚持不懈的作风建设，政治生态持续净化，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巩固，党的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政治生态持续净化。“风成于上，俗化于下。”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开创者、引领者、推动者，党风决定了政风，也影响甚至塑造了社会风气。政治生态则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也反过来影响着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党风政风好，政治生态才能好。曾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广受诟病，特权现象、贪腐问题比较严重，一些地方和领域政治生态恶化。如今，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突出问题得到整治，“快递送礼”“不吃公款吃老板”“变着法子‘吃空饷’”等隐形变异问题有所收敛，公车使用规范了，超标办公用房腾退了，公务用餐严格了，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了承平日久、精神懈怠、心态得到纠正，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逐渐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不断培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明显提升。

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凝聚起现代文化建设合力。党风正则民风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新时代以来，党风政风之变直接引领社风民风之变。弄虚作假、不求实效、铺张浪费、大

兴土木等问题得到纠治，拜金主义、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如“过街老鼠”，求真务实、尚勤尚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风气成为社会共识；节日风气得到净化，走亲访友回归祝福本真，传统节日更轻松温馨；公款送礼基本杜绝，虚高消费得到遏制，商品价格更加亲民，适度消费、理性消费、绿色消费成为主流；婚丧嫁娶讲排场、比阔气等陈规陋习被有效抵制，带动全社会移风易俗；社会新风正气不断充盈，正确价值导向引人向上向善。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推动社风民风激浊扬清，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严查、处理特权现象等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我们党以作风建设新气象重塑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赢得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拥戴。2024年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成效表示肯定的群众占94.9%。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党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氛围基本形成，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保障，巩固了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得到保持和发展，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入推进作风建设，我们党保持和发展了先进性纯洁性，做到了始终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同步代，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始终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在深入推进作风建设中，广大党员干部擦亮了初心、坚定了信念、强化了使命、激励了担当，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勇立时代潮头，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党员干部的行为得到规范引导，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巩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充分调动，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提升。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得到进一步锤炼，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新时代新征程,世情国情的变化对我们党继续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全面从严治党的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新时代新征程对我们党继续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是为党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应该体现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作风的要求，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与发展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我们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对我们的作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广大党员干部精神状态、思想观念、素质能力、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世界局势风云激荡，要求我们党必须以作风建设增强政治定力、锚定发展方向、彰显制度优势、凝聚发展力量，在复杂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和正确政治方向，从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要求我们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不断加强作风建设、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进一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坚持“两个结合”，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注入新的元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我们正确判断形势、科学谋划改革、广泛凝聚力量、推动改革落实，也需要我

们以扎实作风作保障。

作风问题的反复性顽固性和新特点，对我们党继续加强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云南考察时，在讲到中央八项规定成效的同时指出：“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一方面，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四风”问题等影响党的作风的积弊流毒依然存在，稍有松懈就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另一方面，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时有浮现，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现“数字化变异”，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向隐蔽领域转移，遇事推诿扯皮、不愿担当的“躺平式干部”与盲目蛮干、漠视群众利益的“乱作为干部”都还存在。要避免旧弊复燃、新弊滋生，就要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以精准监督、制度创新严加防范，固化作风建设成果。

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提高认识、转变作风。党风彰显党性，党性决定党风。只有党性坚定，党员干部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奉献精神才能得到激发，才能守住政治关、权力关、交往关、生活关、亲情关，展现求真务实、敢于担当、开拓进取、清正廉洁等优良品质和过硬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核心要义，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从思想深处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提高对加强作风建设的认识，进而转变作风。学习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学得深入，才能查得精准、改得扎实。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提高党性修养，筑牢优良作风的精神之基。

坚持“头雁效应”和层层落实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骨干力量，在作风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同时，党的作风不仅体现在各级领导干部身上，也体现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里。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仅要继续形成“头雁效应”、抓“关键少数”，也要全员参与、层层落实。当前，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反对“四风”已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共识，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和思想自觉。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应是作风建设的被动参与者，而应是积极践行者，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作自觉行动。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我们既要通过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以强化思想武装，提高理论修养和党性修养；又要强化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力；还要引导党员干部以作风建设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只有把增强党性、砥砺党风、严守党纪贯通起来，融入日常、化为习惯，才能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让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风腐问题都源于背离初心使命、动摇理想信念、无视群众利益，很多党员或领导干部的腐败变质，都有一个由风及腐、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只有在作风上严格约束，才能在腐败问题上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只查腐不纠风，腐败得不不到有效根治；只纠风不查腐，作风问题还会绵延不绝；风腐同查同治，以“风”挖“腐”、惩“腐”纠“风”，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生根源，以“查”“治”贯通阻断风腐演变，才能推动正风反腐一体深化，不断提升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治理效能。

坚持群众参与、开门改进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作风建设成效如何、存在哪些问题，人民群众感触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党员干部不能闭门修炼、自说自话，应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楚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检验作风建设的成色。虚心求教、问计于民，从群众的实践中吸收经验，从群众的意见中汲取智慧，提高服务人民的本领，把作风转变体现在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中。接受人民监督，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在人民的监督中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让人民的监督贯穿作风建设全过程。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理论部）